

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

——基于帮扶车间的案例研究

李飞¹ 李欣玥² 肖志芳¹ 杨雯渊³

摘要：提升脱贫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心理资本理论和家庭发展理论，本文先从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并构建全文分析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阜平县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案例，深入分析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其个人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以及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带动过程及结果。本文研究发现：在帮扶车间就业促进了农村妇女的市场劳动参与，显著提升了农村妇女个人发展信念和个人发展能力。同时，本地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增加重塑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也随之改变，进而激发了家庭发展信念，改善了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了家庭整体内生发展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其丈夫的影响仅体现在生活层面，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暂未获得现实验证。这说明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在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方面具有现实复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的智慧 and 力量，以及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其家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基于性别瞄准的就业帮扶是一种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精细化以及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农村妇女 本地就业 家庭内生发展动力 帮扶车间 心理资本 家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8; C913.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074/j.cnki.11-3586/f.2024.02.008

一、引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①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欠发达地区妇女就业的减贫效应：基于扶贫车间的准实验研究”（编号：72103063）、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女性经济赋权的减贫效应：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研究”（编号：2021JJ40264）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贫困人口主体能力建设与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研究”（编号：20A23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杨雯渊。

^①习近平，2020：《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页。

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①。这意味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推进方式从“攻坚式”转向“常态化”，动能推力从外部政策推动转向内生发展动力驱动（汪三贵等，2022）。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是脱贫攻坚阶段作为政策术语被纳入贫困治理范畴的重要概念，是中国特色开发式扶贫方针的重要体现，它既是减贫干预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贫困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内生发展动力作为防止返贫和稳定脱贫的重要抓手发挥着关键作用。可见，如何治理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已成为一个跨越脱贫攻坚期和巩固衔接期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增收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一是关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成因。

《行为经济学手册》中指出：贫困不仅是收入上的匮乏，贫困的处境本身也影响着个体决策时所需要利用到的心智资源，进而导致个体做出更不利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决策（Kremer et al., 2019）。目前，学术界认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心理与行为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由自然条件恶劣、公共服务短缺、乡村发展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发育不足等外部性约束引致的心理层面的动力匮乏（左停和田甜，2019）；另一方面，在“心理—行为”框架下，心理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匮乏带来了行为层面的内生发展动力缺失（汪三贵等，2022），而行为上的动力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层面的动力匮乏，造成贫困心理陷阱的恶性循环（洪名勇等，2018）。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制度的泛福利化也是导致脱贫人口缺乏生产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因（汪三贵等，2019），后脱贫攻坚时代，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下的常态化扶贫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和引入反福利依赖政策，进一步加强“扶智”和“扶志”，提升居民对脱贫致富的志向水平（黄薇和曹杨，2022）。二是关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表现。杨永伟和陆汉文（2019）将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总结为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和“等靠要”型。在贫困治理实践中，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思想僵化、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意愿不足、部分扶贫干部对口帮扶带动能力缺乏等（莫光辉和张菁，2018）。三是关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治理路径。一些研究关注心理贫困的破除。比如，傅安国等（2019a, 2019b）认为需要开展心理精准扶贫，使内部心理动力与外部扶贫力量形成合力，构造内外共治、标本兼治的扶贫格局。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的构建对行为、心理层面的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比如，郎亮明等（2021）发现，参与农业科技扶贫对贫困家庭具有明显的扶智效应。汪三贵等（2022）认为，需要从破除贫困文化、纠正非理性行为决策和提高内生发展能力等方面针对性施策。

尽管现有研究对内生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学术界目前较少讨论具体帮扶政策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与机理，因而如何有效治理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仍是学术上和实践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国家非常重视塑造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各部委有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性文件也多次强调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但是，对于如何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这一问题，尚无明确的、可落地的具体提升措施（傅安国等，2020），更缺乏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因此，本文基于实践中的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

帮扶政策来探讨其在精神贫困治理方面的有效性，对于理解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机理，进而制定和优化有利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的针对性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重点关注针对农村妇女的就业帮扶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家庭脱贫与防止返贫的实践中，农村妇女既是需要扶助的群体，更是值得重视的开发式帮扶对象(杜洁等, 2020)。脱贫地区不断涌现的帮扶车间^①正成为推动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促进家庭增收、激发脱贫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有效载体。尽管帮扶车间并不是只致力于女性发展的性别瞄准帮扶，但在产业内容配置上对妇女比较友好，就业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劳动收入结构对男性具有一定排斥性，这使得农村留守妇女和部分返乡农村妇女成为就业主体。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实质上是面向现实的“生活理性”(刘继文和良警宇, 2021)，通过务工就业满足了家庭增收的现实需求(邢成举, 2020)，并重构了农村妇女的生计框架(陆继霞等, 2020; 苏海, 2021)，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伦理、社会感情空间的改变和再造。同时，这些项目不仅促进了农村妇女个人自主性成长，而且有利于农村妇女家庭建设能力和家庭角色更好实现，进而带动农户的发展(李小云和季岚岚, 2021)。

志不强者智不达。在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须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而且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需要更为迫切(苏毅清等, 2023)。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心理资本理论和家庭发展理论，从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并从劳动参与和家庭互动的角度，为如何干预或优化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供务实且富含洞察力的事实依据，揭示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机制及过程。二是从社会性别建构的角度，将妇女自我突破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从“妇女”到“家庭”的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治理路径，生动展现“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帮扶对农村妇女的积极意义。三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生动刻画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外部帮扶与内部驱动、个人就业与家庭发展的互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理解家庭成员在心理与行动上的互动过程，也有助于厘清基于性别瞄准的就业帮扶在改善家庭内生发展动力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助于增强帮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不仅是心理和精神贫困的表现，也是影响持续脱贫的关键，因此需要贯彻“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理念。汪三贵等(2022)认为，内生发展动力是微观行动个体在核心价值信念的引领下，自发参与旨在实现可持续脱贫和发展目标的一切活动的心理倾向与行为能力。这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总结，如何将其拓展到家庭层面已成为理论和现实的迫切需要。为此，本文结合心理资本理论和家庭发展理论，将“扶志”“扶智”政策语境下的家庭内生发

^①本文中所指的“帮扶车间”是2021年后对“扶贫车间”的另一种说法，农村妇女本地就业是指农村妇女在当地的帮扶车间就近就业。

^②《韩非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00页。

展动力界定为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前者是指通过思想、观念、信心等心理或信念方面的干预，帮助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后者是指通过知识、技术、能力、思路等方面的干预，帮助和指导群众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

（一）理论基础

1.心理资本理论。心理资本是个体或组织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它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能够被有效开发和管理，是对个体或组织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的核心积极心理要素（Luthans and Youssef, 2004; Luthans et al., 2007）。心理资本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有信心（自我效能）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第二，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乐观）；第三，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希望）；第四，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韧性），以取得成功（熊猛和叶一舵，2014）。如何对个体或组织的心理资本存量与质量进行干预是心理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落脚点。对于脱贫地区的农村妇女而言，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自身素质、政策覆盖等因素的影响，她们在经济社会参与和资源占有等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她们的境况在文化、制度、环境的互动中进一步恶化，导致农村妇女在个人成长和家庭角色中表现的心理状态偏消极，对未来缺乏信心。通常，家务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家庭妇女生存和经济交易的基础，在帮扶车间就业帮助她们走出家庭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实现了农村妇女的社会空间再造（陆继霞等，2020）。这既是对农村妇女的一种赋权，也是一种有效的心理资本干预方式。农村妇女通过劳动参与获得劳动回报，冲破了她们在社会空间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束缚，她们的劳动动机和体验塑造着女性的主体性，激活了她们自我效能感，增强了她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动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促进了农村妇女个体心理资本的形成。同时，这种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资本干预还具有传染效应。也就是说，在家庭组织框架内，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资本干预不仅能改善其个人发展信念，而且能透过对妇女的影响激发家庭其他成员的发展信念，进而形成推动家庭发展的合力。

2.家庭发展理论。家庭发展能力是指家庭利用所能获取的各种资源，满足成员基本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梁辉和郑婷婷，2019）。家庭发展能力一般包括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并非完全被动的，而是一个能积极调整和适应的能动主体。因此，在对家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时需要嵌入家庭再生产的内在逻辑。现有研究认为，家庭发展能力的转变是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吴帆和李建民，2012）。本文认为，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为家庭内部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在深受贫困文化影响的地区，农村妇女享受的家庭权利和资源往往比较少。农村妇女通过在帮扶车间就业，获得了一份相对独立的经济收入，有助于提升她们的家庭地位，从而获得更多可支配的家庭资源，进而增强她们改善和建设家庭的能力，如经济能力、支持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同时，帮扶车间促进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瞄准特征的外部干预，促进了资源的精准传递，激活了家庭内部的建设能力。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压力，家庭内部的个体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利益需求和动机，存在着协商、分工、合作和博弈，这些关系不仅存在于父代与子代之

间，也存在于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殷浩栋等，2018；陶涛等，2021）。因此，这种外部干预起到了建立家庭共识和凝聚家庭力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基于心理资本理论和家庭发展理论来分析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需要厘清发展信念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在“扶志”“扶智”政策语境下，发展信念和发展能力是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一体两面”，既可以通过信念更新来促发行动能力改善，也可以通过能力提升来正向反馈信念更新。发展信念作为心理资本理论的具体内涵，它既体现在妇女个体层面，也体现在家庭层面，并共同作用于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也是本文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

（二）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对两个理论核心观点的论述，本文沿着以下两条思路来构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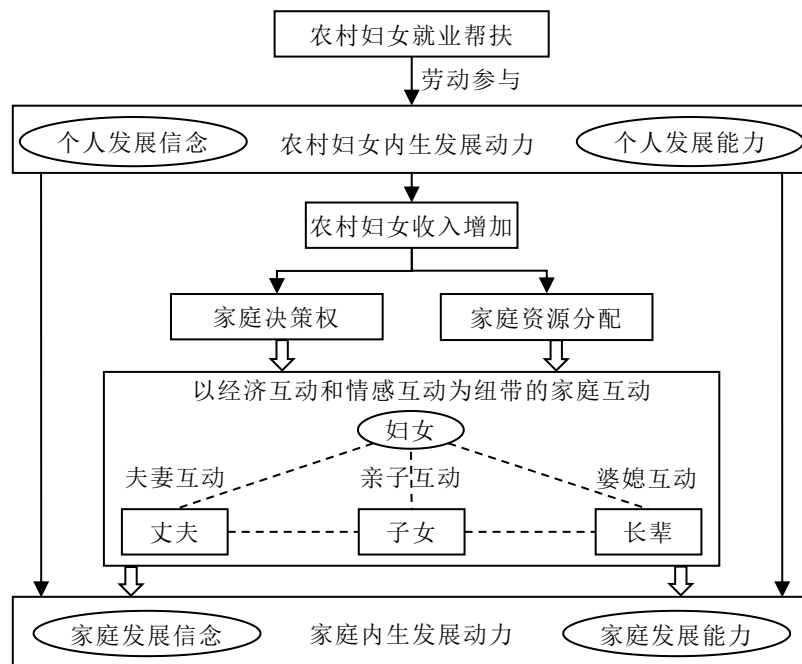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促进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分析框架

其一，基于农村妇女个体层面的“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劳动参与—农村妇女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路径。在过去，农村妇女曾被称为“看不见的农业生产者”，因为农村妇女从事的劳动大部分是不计酬的家务劳动，这种劳动安排是由家庭的初始分工决定的，难以对农村妇女形成有效激励。相比而言，本文研究农村妇女在本地帮扶车间就业，这不仅是具有社会性别偏好的一种帮扶，更是让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一次机会。在市场劳动参与中，农村妇女的自我认知更加清晰，发展信念得以提升，进而促进了心理资本的形成。市场劳动参与还培养了农村妇女的工作技能、社交能力和协作能力等个人能力，从而帮助她们摆脱发展能力不足的局限。这些就业帮扶有助于切断妇女行动失灵加剧心理层面内生发展动力匮乏的影响回路，可最终实现农村妇女发展信念和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

其二，由农村妇女个人引致家庭层面的“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家庭互动—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路径。女性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自我突破和成长的能力，更体现在影响和改变家庭的能力。农村妇女就业

收入增加有助于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促进她们母职角色和家庭责任的践行,从而增进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具体而言,在亲子互动中,农村妇女本地就业的在场可得性,既有助于其母职的承担进而让子女在生活上获得实质性照顾,也有助于榜样的塑造,使母亲通过言传和身教给予子女更多正确的引导。在夫妻互动中,农村妇女就业提高了其家庭建设能力,家庭“相对位置”的变化可能驱使丈夫将妻子作为参照对象,形成平行的社会比较,从而激发丈夫产生积极向上的心理资源。在婆媳互动中,农村妇女就业后其劳动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而她们也愿意在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将家庭资源分配给长辈,从而能增进妇女与长辈之间在理解、尊重、关爱等情感价值基础上的互动。综上所述,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不仅是家庭妇女劳动参与和家庭创收的过程,更是在互动中调节家庭关系的过程(李小云和季岚岚,2021)。而且,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引致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提升,既是内嵌于农村妇女与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也是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的结果。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 案例样本

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属于过程类研究命题,基于理论构建式的案例研究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本文根据案例分析中的典型性原则和理论抽样原则,选取河北省阜平县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作为研究主体。

阜平县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太行深山区、革命老区,也是原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①。精准扶贫以来,阜平县结合本地劳动力资源禀赋,利用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白沟国际商贸城箱包加工产业转移的机遇^②,大力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小手工业。近年来,该县小手工业发展迅速,呈现“从无到有”“由点转面”的发展趋势,成为带动当地妇女就业和促进家庭增收的主要方式。截至2022年8月,阜平县家庭手工业加工厂(点)达到226家,累计覆盖农户6900多户(每户家庭中至少有一位劳动力就近就业),户均年收入达到2万元。当地的帮扶车间主要生产箱包、服装、毛绒玩具、佛珠、酱菜篓、景泰蓝等20多种产品。同时,针对行动不便或不能离家的群众,当地大力发展插花、纸箱制作、手工编织等“小手工业进农户”项目,累计覆盖农户3566户,户均年增收

^①2012年12月29—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考察了龙泉关镇的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2012年,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有950元和980元,远低于国家年人均收入贫困线标准,贫困发生率分别高达79%和75%。资料来源:《习总书记去过的贫困村,如今变成什么模样》,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4102/34261/34267/34275/Document/1471457/1471457.htm>。

^②白沟国际商贸城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被誉为“北方的义乌市场”。白沟国际商贸城批发的商品主要包括箱包、日用百货、儿童玩具等,是集批发和零售于一体、品类非常齐全的一个集贸市场,产品远销北欧和俄罗斯等地。2017年以来,因雄安新区开发,白沟国际商贸城的箱包加工产业急需转移,阜平县委县政府充分把握产业转移的发展机遇,利用距离优势(阜平县与白沟国际商贸城仅相距约200千米)和产业补贴等优势吸引了大量企业到本县落户。

超过 4500 元。2021 年，阜平县全县手工业产值超过 10 亿元，发放工资超过 1 亿元^①。这类帮扶车间的产业属性、务工门槛、就业灵活性和就业距离等特征很好地衔接了农村妇女通过务工实现增收的现实需求（邢成举，2020），重构了农村妇女的生计框架（苏海，2021）。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底，中国中西部地区 22 个省（区、市）的帮扶车间数量达到 3.4 万个，吸纳脱贫人口达到 44.7 万人^②。这一数字仅仅是各地已经颁证授牌的帮扶车间数量，根据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的了解，未达到认证标准或未申请认证但具有帮扶性质的该类企业数量远超现有统计规模。这为本文研究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极佳的案例素材。

（二）资料收集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课题组先后 3 次前往阜平县围绕“帮扶车间”开展调研，通过深度访谈和查阅二手资料等方法收集了帮扶车间、就业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相关信息和资料。其中，半结构式访谈是本文获取资料最主要的方式，同时通过现场观察和收集二手资料获得交叉验证的素材，以提升案例分析的效度。

1. 半结构式访谈。为保证半结构式访谈内容与研究目标一致，课题组在正式访谈前对相关访谈对象进行了多次预访谈，并根据研究主题拟定了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课题组主要访谈了以下几类人员：一是阜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乡村振兴部门负责人、县帮扶车间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村（社区）干部等。访谈问题倾向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整体安排和政策部署、小手工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人文环境等方面信息。二是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访谈问题主要围绕“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这个主题，深入了解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前的家庭生活状况、就业后农村妇女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变化、子女营养健康和教育投入、家庭氛围、未来期待等方面信息。三是帮扶车间领导、技术骨干、车间员工。课题组访谈了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同事，向她们了解农村妇女的就业情况和就业带来的变化，以及她们如何看待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带来的改变。此外，为了对农村妇女访谈内容进行三角验证，课题组还对部分农村妇女的丈夫和子女进行访谈，主要验证农村妇女访谈内容的真实性，以及了解他们自身的变化。

在实际调查中为保证资料准确性和全面性，课题组中有 4 位女性访谈人员专门负责对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进行访谈，并尽量保障访谈人员与受访妇女年龄相仿，以便能够降低访谈对象的戒备心和缩小心理差距，激发情感共鸣。课题组还聘请了 3 位当地妇女作为访谈助手，以便当访谈对象提出不易理解的观点或交谈中出现歧义观点时，访谈助手能在访谈现场解释清楚，进而确保访谈人员对内容理解准确。此外，因访谈需要占用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工作时间，访谈人员在访谈前会告知访谈对象将根据访谈时长给予其 10~20 元补贴（相当于访谈时长的计件工资），以确保她们能安心接受访谈。课题组累计访谈 106 人次，累计访谈时长 4213 分钟。访谈有关情况详见表 1。

^①资料来源：阜平县手工业发展办公室内部资料。

^②资料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全国就业帮扶车间运行情况回稳向好》，<https://m.gmw.cn/baijia/2022-08/20/35966808.html>。

表1 访谈信息表

序号	访谈时间	访谈对象	主要访谈内容	访谈人次	累计访谈时长(分钟)
1	2020年8月 2021年7月 2022年8月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乡村振兴部门负责人	了解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防返贫监测、产业帮扶和帮扶车间发展等方面政策安排	7	327
2	2020年8月 2021年7月 2022年8月	县帮扶车间主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	了解新冠疫情对全县帮扶车间发展的总体影响； 了解行业部门对手工业的支持政策； 搜集县帮扶车间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的有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带动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真实素材	8	421
3	2020年8月 2021年7月 2022年8月	帮扶车间相对集中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	了解乡镇帮扶车间动态发展和监管情况； 搜集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了解到的有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带动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真实素材	10	230
4	2022年8月	村(社区)干部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 了解村(社区)干部关于当地妇女就业对村庄和家庭影响的看法； 了解在帮扶车间就业前后当地妇女的家庭地位、就业情况和家庭关系等	4	146
5	2020年8月 2022年8月	帮扶车间领导、 技术骨干、车间 员工等	了解车间发展、车间日常管理情况，比如订单业务、人员招聘、日常管理等； 了解各个工序的操作及计件工资等情况； 重点搜集车间员工了解到的有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带动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真实素材	15	530
6	2022年8月	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	了解农村妇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家庭决策权等基本情况； 重点了解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前后对丈夫、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以及她们对家庭未来的期望	52	2093
7	2022年8月	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丈夫	了解丈夫本人的就业情况及他们对妻子就业的态度； 重点验证妻子就业后给丈夫本人及家庭带来的影响	5	248
8	2022年8月	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子女	了解子女对母亲就业的支持情况； 了解母亲就业后子女本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重点验证母亲就业后家庭各方面的变化	5	218
总计				106	4213

对于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的访谈资料主要来自课题组于2022年8月对阜平县13家帮扶车间的实地调研。通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访谈对象，课题组一共访谈了来自不同家庭的52位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访谈对象的基本特征如下：一是个人特征方面，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年龄集中在26~55岁（26~30岁1人，31~40岁20人，41~50岁27人，51岁及以上4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平均在岗时间为29个月，平均工资为每月2803元。二是家庭特征，受访妇女的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79人，义务教育阶段平均在读子女数为1.83人，有36户家庭是脱贫户或防返贫监测户。为保证访谈内容的有效性，课题组还对受访妇女的同事、丈夫和子女进

行了访谈。参考访谈提纲,若从访谈对象处获取的信息达到饱和便结束访谈。所有访谈录音资料在当天就转化为文字稿,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统一编号^①。

2.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除采用访谈方式收集资料外,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也是本文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一是现场观察。课题组实地观察和体验受访妇女的工作场景,并到受访妇女家中探访,对其认知水平、能力水平、心理状态形成直观认识。二是二手资料。表2对本文采用的二手资料来源进行了汇总。所获取的现场观察信息和二手资料将帮助课题组对访谈内容进行三角验证,进一步确保案例分析的效度。

表2 本文采用的二手资料来源统计

资料类型	资料收集结果	资料来源
外部资料	《农村女性经济赋能研究报告》 阜平县帮扶车间促进妇女本地就业的相关新闻报道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2021年) 阜平县人民政府网、中国新闻网、河北经济网、搜狐网(2017—2022年)
内部资料	1996—2010年历年的《阜平县志》 阜平县小手工业车间发展规划、总结等 所访谈的帮扶车间工资表	阜平县档案局 阜平县手工业发展办公室 帮扶车间内部资料

注:外部资料中括号内的年份表示通过网络收集资料的年份。

四、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

本文将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统一到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概念框架内,以帮扶车间促进农村妇女本地就业这一具有社会性别瞄准的就业帮扶模式为突破口,首先分析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个人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效应,其次从家庭互动视角来分析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过程,最后从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变化的视角来检视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效应。

(一)农村妇女本地就业的个人内生发展动力提升效应

本文借鉴傅安国等(2020)关于个体脱贫内生动力的“三因素洋葱模型”来整理和组织受访妇女的访谈内容,将自我效能中的价值观和自我观提炼为农村妇女个人发展信念,并从学习能力、工作技能、协作能力、社交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等方面归纳农村妇女个人发展能力,观察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前后相关构念在现实中的变化。

1.个人发展信念。其一是价值观。它是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人生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等方面。价值观作为人格的信念,处于人格的最高层,对人格起着统领作用。只有经过价值判断且被认可的信念才能转化为行为动机,并以此为目标引导人们的行为。人们对于“好生活”的期望不足会导致他们追求“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不足。这说明正确的价值判断对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打破精神贫困陷阱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妇女到帮扶车间就业打破了传统以家为核心的生活场

^①访谈编号由受访者姓名的首字母和访谈序号组成(对于车间领导和负责人,其访谈编号中姓名首字母统一标注为“LB”)。

域的局限，她们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会进一步迭代关于什么是“好”的价值判断。为此，本文从人生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等方面对受访妇女的价值观进行归纳。

首先是人生价值观。常言道“人各有命”，这是人们对于命运的一种消极认知和无力抗争的表现。在访谈中，笔者询问了受访妇女关于对“人各有命”的理解，大部分妇女相信命运对生活的主导，但也有一部分妇女坚定地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人才是主导的力量、能动的力量、创造的力量。一位受访妇女表示：“上班后一些观念会发生变化，如果没上班，我感觉心态应该不是今天这样开阔。因为走上社会与各个层次的人和事都接触过后，感觉跟开悟了一样，同样的事情对我的影响也不一样了。”（访谈编号：GY29）

其次是劳动价值观。帮扶车间实行计件工资制，妇女就业收入主要取决于不同工序的计件单价和工作时长。工序选择是由车间负责人根据妇女就业经历和工序整体布局来决定的。因此，工作时长是影响工资的最主要因素。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时间太重要了，假如我上午7点来，别人上午10点来，即使她再快也赶不上我，工作时长不够，也挣不了多少。”（访谈编号：LK09）帮扶车间大多实行打卡管理，工作时间一般为上午7:00—11:30，下午13:30—18:30，将近9个半小时，部分车间提供午餐。帮扶车间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员工早上可以提前上班，下午可以提前下班，如果需要赶工期，员工有时可能还要晚上加班。许多受访妇女反映：“上班后再也没睡过懒觉了，每天准点起床来上班，在这儿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要是偶尔休息一天，还感觉时间可长了。”

最后是家庭价值观。在儒家文化“家本位”伦理导向下，妇女的劳动力配置是以家庭为取向的，其行为逻辑遵循家庭整体理性逻辑而非个体逻辑。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妇女，她们受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更大，嵌入家庭的程度更深，承受家庭的约束也更多（胡军辉和叶尔肯拜·苏琴，2016）。在阜平县，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受访妇女走出家庭到帮扶车间就业得到了其丈夫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不失为一种进步。有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我丈夫挺支持我来这儿工作的，他觉得也是一种独立。”（访谈编号：ZLY12）

其二是自我观。自我观是指个体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是对自我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对自我权利、地位、尊严和价值的看法和观点。本文将自我观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概念，包括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具体指妇女自立自爱、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客观认识自身优点和不足等心理表现。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自强自立且拥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她们觉得“在车间工作挣多挣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挣钱，感觉没有被社会抛弃”。二是自我调节，包括自我管理和情绪调控。具体指妇女自省自律、乐观积极等心理表现。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会在工作中形成集体感，并在工作中激发竞争意识，比如在同一工序作业的妇女之间会比较每天完成的工作量。不过，这种比较和竞争是良性的，她们会积极面对并将此作为一种激励。车间工作激发了妇女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明确的发展目标让她们将发展信念转化为实际的劳动投入。

“有竞争，好比说今天你干了多少，她干了多少。如果人家做得多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努力点多做一点。”主动加班可能是她们避免落后的一种策略，甚至身体不舒服她们也会坚持工作。“如果时间允许我会主动加班，觉着不困不累就多干一会儿……身体上一般的小毛病也不影响工作，我还

是会坚持上班。”（访谈编号：MHY13）

2.个人发展能力。帮扶车间促进了农村妇女个人的自主性成长。农村妇女通过就业实现了劳动转型。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她们在学习能力、工作技能、协作能力、社交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拓展和提升。

其一是学习能力。帮扶车间会安排专人对新员工进行短期培训，帮扶车间里的机器设备对很多刚来车间工作的农村妇女而言是新鲜事物，接受培训时她们会被手把手地教授车间各工序操作规程和各项技术。试用期（一般2个月）过后，她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工序岗位开始独立工作。在访谈中，笔者会询问受访妇女刚接触这份工作时的困难，以及她们是如何去学习新技术的。许多受访妇女告诉笔者，刚接触工作时会有一些抵触情绪，一些工序虽然看似简单，但要做到不返工需要非常细心，且需要不断重复同一步骤来提高工作效率。一些有挑战性的工序能进一步激发农村妇女的学习能力。有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来这儿刚开始扎里布（一个工序），之后是扎面，一点一点进步，觉得也挺满足，挺有挑战的……刚开始蹬平车也不会，想干台面来着……我一点一点学，原来干得挺无聊的，现在干这个一天挺充实的。”（访谈编号：MSY15）

其二是工作技能。大部分帮扶车间主要承接某类或几类产品（比如箱包、帽子、帐篷等）的专业化生产。因此，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劳动模式和工作内容相对固定。虽然产品比较固定，但不同批次的款式和单价存在差异。因此，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需要根据产品需求学习新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工作技能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升。

其三是协作能力。虽然帮扶车间实行计件工资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需要与不同工序的工友协作。有的帮扶车间会根据产品特点，将几个关联紧密的上下游工序组合起来，形成生产小组。同时，帮扶车间建立目标管理机制，将残次品率、成品数量等作为考核内容，达到要求后对小组成员进行奖励，鼓励小组之间竞争。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我们小组有8个人，干得要是超产了，这个组里面所有员工都有100元的超产奖。”（访谈编号：YLH05）虽然奖金不高，但她们非常看重，为了获得超产奖她们会商讨策略，优化组内分工，提高协作效率。

其四是社交能力和抗挫折能力。来帮扶车间工作之前，农村妇女社交范围比较狭窄。来帮扶车间工作后，她们遇到了许多同龄人，身边有了一些知心好友。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以前有些心里话不能和长辈说，在这儿有同龄人，我更愿意跟姐妹们交流。”（访谈编号：LGX14）此外，在工作中面对困难和处理差错的经历也增强了妇女的抗挫折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她们每天完工的产品都有专人质检。而且，管理越规范的帮扶车间，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严格。因此，“返工”成为她们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在访谈中笔者询问：“如果您做的产品需要返工，您是什么感受？”绝大部分受访妇女都能坦然面对，她们觉得：“没事儿，拆下来重新弄好。只要学会就行了，下次多注意容易出错的地方。”

简言之，能力具有自生产性和相互替代性，能力的全面发展也不是某项能力的单独作用。帮扶车间就业所需的个人能力是多方面的，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同样也从各个方面发展了个人能力，不同能力相互交织共同形塑她们的综合素质。

（二）家庭互动视角下的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过程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元。妇女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承担着母亲、妻子、媳妇等多重家庭角色。她们在完善家庭功能，促进家庭互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帮扶车间就业能使农村妇女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深化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使原有以“柴米油盐”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性互动向生产性互动和更深层次的情感互动转变，有助于构建符合家庭长远发展目标的资源分配方式，优化家庭成员的行动集合。家庭互动实质上是通过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和婆媳之间的具体互动激发和重构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的“微治理”功能。为此，本文从亲子互动、夫妻互动和婆媳互动出发，归纳总结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前后其家庭互动方式和内容的细微变化。

1. 亲子互动。家庭是子女早期成长的主要场所，父母作为子女重要的抚养者和陪伴者，对子女各方面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子女与母亲的联结是尤为独特而紧密的，母亲的榜样效应对子女心理和行为发展影响深远。为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亲子互动过程及结果加以总结，进而呈现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过程。一是母亲对子女的言传和身教。在帮扶车间就业不仅影响了农村妇女自身对劳动的认知，而且她们还将这种自我觉醒传递给了子女。许多受访妇女告诉笔者：“我会告诉孩子们要努力读书，并将工作中的一些事情与孩子们交流，现在孩子们也觉得挣钱不容易，知道得好好读书。”除了言语的教导，母亲的身教也是亲子互动的重要形式。比如，一位受访妇女表示：“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都得去车间，不干活就没有收入。我女儿知道这些，她说‘我得好好上学，平常也不跟你耍零用钱了’。”（访谈编号：LK09）二是子女对母亲关爱的回应。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后，子女的自理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会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在车间工作后，大儿子在我下班前会将晚饭准备好，还可以辅导妹妹学习，家里他都管了。”（访谈编号：YJ06）总之，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在场可得性使得母亲工作的辛劳更容易被体察到，从而更容易在亲子互动中激发子女对母亲付出的回报，并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子女的理解和感恩等情愫。

2. 夫妻互动。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互动质量取决于夫妻共同的生活目标、人生理想、情感旨趣，以及各自的自我意识、文化修养等因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夫妻互动过程及结果加以总结，进而呈现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过程。一是积极情绪。具体是指夫妻双方通过言语或行为表达温暖和支持等强度较高的积极情绪。在访谈中，笔者会询问受访妇女：“与原先相比，您跟您丈夫现在的感情怎么样？”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现在感觉挺好的，原先我光在家里照顾孩子，经常生气，那时候和丈夫经常为钱争吵。现在我自己工作挣钱了，家庭地位都不一样了，现在与原先相比夫妻感情要好多了。”（访谈编号：YJ06）二是积极卷入。具体是指夫妻双方能够倾听对方、中立或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回避问题等积极互动的行为。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妇女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表达权和决策权。比如，一位受访妇女近期正与丈夫商讨想去买一辆二手车，夫妻俩商定各支付一半的购车款。三是积极行动。具体是指夫妻之间的一些积极情境和积极行为的发生。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原本是农村妇女家庭劳动的主要

形式。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后，一些家庭的家务劳动承担者发生了性别转换，丈夫从“偶尔”分担家务劳动变成了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访谈中，笔者会询问受访妇女：“之前您丈夫平时做家务吗，现在呢？”谈及此问题时，许多受访妇女幸福地回应：“原来他肯定是不做家务的，都是给我管，现在我来上班了，回去一看饭做好了，衣服什么的也都洗了。”（访谈编号：SXY28）

3. 婆媳互动。婆媳关系是大多数婚姻都绕不过的一种家庭关系。在传统的家庭分工观念影响下，婆媳关系通常体现在很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它既可以小到“米饭软硬”的细微层次，也可能涉及孙代抚育方式等重要问题（杜鹃，2022）。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活方式的代际差异构造了复杂、异质的家庭生活情境。维持良好的婆媳关系需要激活家庭关系的情感动力，在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中达到平衡状态。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提升了女性的经济独立能力，增强了女性与传统性别规范的谈判能力，使她们获得重构亲属关系的实践权，从而使婆媳关系在家庭角色、地位与权利的转变过程中实现了自洽。在访谈中，笔者会询问受访妇女：“您现在和婆婆怎么相处，关系怎么样？”大部分受访妇女告诉笔者：“现在上班挣钱了，逢年过节都会给婆婆买些新衣裳，平时也会给她买些日用品，关系缓和了不少。”笔者也从受访妇女口中了解到，在她们上班后，婆婆会更加主动地承担一些家务，帮忙照料孙辈。总之，婆媳互动在相互帮衬中增强了彼此之间理解、尊重、关爱等情感联结。

（三）农村妇女本地就业的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效应

1. 家庭发展信念。近年来，诸多行为经济学家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建构贫困心理陷阱的理论模型，重点关注志向、希望和自我效能等心理因素差异在减贫中的重要作用（Mani et al., 2013; Haushofer and Fehr, 2014; Haushofer and Salicath, 2023），这为研究和理解家庭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提供了理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在论述妇女个人发展信念的内容时从自我效能中的价值观和自我观进行了梳理，但这与家庭发展信念内涵并不冲突，在心理资本理论中，个人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信念在内核要素上具有统一性。根据 Luthans and Youssef（2004）提出的心理资本理论，本文将志向、希望、生活态度和坚韧等心理动机因素作为家庭发展信念的组成。

其一为志向。它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即便面对困难，也能“穷且益坚”，不畏艰险，有远大理想，不屈服于命运，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艰辛。贫困心理学理论认为，志向失灵会导致家庭决策低效，这是贫困家庭无法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心理约束（Dalton et al., 2016）。在访谈中，笔者询问受访妇女：“您怎么理解‘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有一位受访妇女说：“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要靠自己，必须得靠自己。”（访谈编号：WXY27）一位车间负责人表示：“女人挣钱以后她能独立，而且是思想上独立，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访谈编号：LB02）同时，志向在家庭范围内具有“传染性”，尤其是母亲的志向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对子女具有重要影响。Serneels and Dercon（2021）研究发现，母亲的志向对子女受教育程度具有直接影响。在访谈中，一位家境较好的33岁受访妇女表示：“我丈夫不愿让我来上班，让我管好家就行了。但因为有个女儿，我必须上班，要给她立一个榜样，让她觉得这钱难挣，不好好上学就得吃苦。我告诉女儿，女孩干不了体力活，必须好好上学，考上大学，在社会上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要能养活自己，哪怕捡废品都必须有个收入，

不用靠谁养活，自己有份收入就有存在感。”（访谈编号：GY29）

其二是希望。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人生就是在坚持中看到希望，在坚持中寻找希望。受访妇女坚信教育是改变家庭命运的伟大力量，她们克服重重困难想让子女上大学，这是她们心中追逐的希望。在参与就业的过程中，与赋闲在家相比，农村妇女对于能工作挣钱感到满足。但她们也体会到“活多钱少”的艰辛和无奈，并将其归因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从而帮助她们树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并由此产生了“希望子女能上大学”的强烈内在需求。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受访妇女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人只能依靠不足每件0.1元的工序计件工资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一位小学文化水平的受访妇女说道：“我经常劝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像爸爸妈妈没有多大出息，只能靠卖苦力挣点零花钱。孩子们还是要上学，以后找一份好工作，肯定要比我们好。”（访谈编号：CEM32）

其三是生活态度。在帮扶车间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妇女之间形成了高频的社会互动，强化了对于信息的分享和交流，进而改变了她们的观念。上班之前，她们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就是打牌、闲谈。上班之后，她们会通过“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关注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有的受访妇女利用工作间隙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她说：“我考了驾照，花了八九千块钱，都是我自己挣的钱。考了五次才通过的，就科目二卡住了。其实我岁数也不小了，43岁报考的，拿到驾照都46岁了。”（访谈编号：SXY28）还有的受访妇女从学习新的工序中获得满足感，这些都是她们积极生活态度的表现。妇女的穿着也是她们表达生活态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有一位受访妇女告诉笔者：“生活要有自己的颜色，要有自己的活法。以前想买一件短袖都舍不得。现在自己挣了一点钱就可以买自己看上的东西了。”一位车间负责人说：“以前她们才来的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现在不一样了。”（访谈编号：LB02）

此外，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有一类本地就业的妇女是外出打工后又返回家乡的。一些母亲为了不再和子女长期分离，放弃在外地打工的更高收入，返回家乡在本地就业，这也体现了她们生活态度的转变。而母亲在本地就业使得她们能更好地陪伴子女成长。对子女而言，陪伴在身边的母亲不再是“视频里的母亲”，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再要跨越千山万水。在访谈中，笔者通过观察受访妇女的亲子互动，深刻体会到了“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而这份“礼物”也让母亲在工作中更加安心和踏实，她们得以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全情投入工作。

一位44岁的受访妇女之前在石家庄市某大学担任宿舍管理员（临时工），刚外出打工时她的孩子只有八九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令她特别心酸的是，一打电话给孩子，孩子就说“妈妈你回来，我特别想妈妈”。后来，村里办起了小手工车间，她就返回家乡在本地就业了。她说：“再也忍受不了‘骨肉分离’的痛苦了，不能陪伴孩子是一种遗憾。不想出去打工了，在这儿可以随时回家，晚上可以照顾他们。”（访谈编号：FJM18）

“孩子是需要父母陪伴的。孩子还小，自己出去打工一两年不回来，孩子在心理上就没有安全感。而且，孩子从上初中开始就要离开家了，上初中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上高中一个月回来一次，上大学都是一年或半年只回来一次，那时候想陪伴他们也陪伴不了。”（访谈编号：ZLH25）

其四是坚韧。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十分辛劳，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有时候她们只能默默承受，但她们表现得异常坚毅和果敢，不等不靠，勤勉奋进。一位受访妇女表示：“我觉得不管什么

样的困难都会过去的，只要你坚持就行……我来车间来得早，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长，我挣的钱多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勤奋。”（访谈编号：YJ06）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们也具有很强的心理韧性，能够坦然面对挑战。正如一位受访妇女所说：“最困难的时候扛不住也得扛，不扛能怎么办，不可能让孩子去扛、让父母去扛。”（访谈编号：ZLH25）

2.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它不仅取决于家庭禀赋和家庭功能基础上的家庭再生产，更取决于家庭代际合力的强度。现有研究主要构建多维度综合指标体系来测度家庭发展能力。比如，王磊（2023）从经济能力、学习能力、凝聚能力、支持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吴帆和李建民（2012）把家庭发展能力划分为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鉴于此，本文在结合现有研究和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将家庭发展能力归纳为经济能力、凝聚能力和阻贫能力三个方面。

其一是经济能力。它是家庭获取收入以支持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于增加家庭收入、缓解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靖，2008）。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就业机会，意味着她们拥有从家庭外部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能够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郑筱婷和李美棠，2018）。本文从家庭收入及其来源和家庭储蓄两个方面对家庭经济能力进行总结。一是家庭收入及其来源。在不考虑男性劳动力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妇女就业能有效改善家庭收入约束，拓展家庭收入来源。据笔者调查了解，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每个月能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相较于当地物价水平，收入尚可，而且工作稳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确保脱贫家庭中的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稳定就业成为防止返贫促进增收的关键。课题组实地调研期间，受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的影响，许多男性劳动力就业受阻。而阜平县这种具有社会性别倾向的帮扶车间所受影响较小，甚至有些车间的产品订单还有所增加，为脱贫家庭妇女就业提供了保障。据帮扶车间管理部门相关人员介绍，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当地帮扶车间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0多家，有力地保障了脱贫家庭的工资收入，这对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家庭储蓄。有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尹志超和张诚，2019），从而可以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李胜旗和廖前豪，2023）。农户的储蓄偏好既源自传统观念，更是在脆弱性压力下应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受访妇女的工资大部分用于家庭开支，个人开支仅占其工资收入的10%~20%。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带来的收入增长大部分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或作为家庭储蓄，这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生产条件，还增加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一位车间负责人告诉笔者：“她们爱存钱，除了给孩子们花钱，就是去县城把钱存到银行。可能因为咱们是农村人，就有存钱的习惯，因为挣钱难啊，这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浪费。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家里有了积蓄买了电动摩托车，有些家里连汽车也买上了。”（访谈编号：LB03）

一位46岁的受访妇女告诉笔者：“工资主要花在家里，自己也花，但花得少，大概10%吧。除了买点吃的和用的，衣服和化妆品又不买，反正都贴补家用和供孩子上学了。”（访谈编号：SXY28）

其二是凝聚能力。它是使家庭成员亲密地团结在家庭内的情感合力，不仅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还可防止家庭内耗。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具有“家庭黏合剂”的效应，有助于家庭凝聚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妇女就业缓解了家庭收入约束，分担了家庭经济压力，减少了经济条件困难导致的一系列家庭矛盾。许多受访妇女告诉笔者，以前她们和丈夫经常因缺钱而争吵，尤其是子女上学、长辈生病时需要大额开支，但家里实在缺钱，也不知道上哪儿借钱，人总有一种无助感，夫妻之间争吵得厉害时，她们甚至想要抛下一切一走了之。现在不一样了，她们上班后自己也能挣钱了，家庭经济条件没那么困难了，这几年家中也很少因缺钱而争吵。另一方面，帮工等形式的家庭合作生产促发了家庭成员的集体行动，凝聚了家庭成员的向心力。比如，当帮扶车间突然接到新订单或者需要赶工期，有些农村妇女的丈夫会主动去车间帮忙，从而使得车间的生产关系延伸到其他家庭成员。生产中一些简单工序可以由妇女将生产物料带回家里由全家老少一起帮忙来完成（如用钳子穿绳）。共同的劳动参与过程既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又有助于缓解家庭矛盾，进而培育和和谐的家庭氛围。

其三是阻贫能力。它是以家庭人力资本为核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能力。母亲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通常大于其他家庭成员，母职角色使她们更加了解子女，也更有可能发现子女的需求并相应调整对子女的消费投入（郝晶辉等，2021）。有学者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母亲在儿童身上的消费倾向高于父亲（Thomas，1990）。根据“好母亲”假说，如果母亲对家庭经济资源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儿童会享有更多特定商品的消费，且儿童福利水平也会更高；母亲收入更高可能更有利于儿童的教育，进而更有利于儿童的人力资本培育（Phipps and Burton，1998）。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一些受访妇女因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辅导子女学业而愿意倾其所有资助子女上辅导班。此外，在一个家庭中，母亲角色使妇女天然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母亲会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改善子女的福利和家庭消费（刘靖，2008）。因此，妇女就业获得自主收入对于保障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投入至关重要。

“以前家里种什么就吃什么，很少买菜，现在总是买菜买肉，家里的孩子们吃得也好了。”（访谈编号：LB02）

“这会儿孩子需要什么、吃什么，包括学习用品上，那也不能比别人差，需要什么就买，想也不用想。要是以前，哎呀能不用就不用。”（访谈编号：GTQ38）

就业帮扶有助于改善农村妇女的家庭内部建设能力，能够促进子女产生积极向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并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子女更加刻苦学习并跳出代际贫困的陷阱（吴娜等，2021）。虽然在访谈中无法有效获取母亲就业收入增加对子女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等产生的具体影响，但是吴贾等（2022）研究发现，母亲收入提高1%可分别提高子女数学成绩、字词成绩和非认知能力0.09个、0.05个和0.13个标准差，并且有效证明了母亲收入提升对家庭氛围具有改善效应这一关键机制的作用。

五、进一步讨论：农村妇女本地就业与丈夫内生发展动力提升

（一）现实考察

在受访的52位农村妇女中，有27人的丈夫有外地务工经历，有19人的丈夫有本地务工经历。

但在课题组实地调研期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受访妇女的丈夫赋闲在家。此外,受访妇女中,有2人的丈夫已经去世,有2人已经离异,有2人的丈夫因病、因残无劳动能力。笔者通过询问受访妇女“您工作后丈夫在生活和在工作方面是否有变化,具体是哪些表现”来深入了解其丈夫内生发展动力变化的具体呈现。然而,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受访妇女的丈夫产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活方面,比如,他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受访妇女的丈夫的这些改变也在笔者与其子女和车间负责人的访谈中得到交叉验证。

“他比原先变好了。下班后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到饭点他就会打电话提醒我下班回家吃饭。他现在没到外面干活,在家里还会干干家务,那之前他是不干的。”(访谈编号:MHL20)

“以前男的从来不会做饭,女的做好了端到跟前他才吃饭。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反转,不等妻子下班,男人们已经把饭做好了,而且他们会盛好饭端到桌上来。”(访谈编号:LB02)

“妈妈上班之后,爸爸做家务变多了。”(访谈编号:JS01)

从访谈情况来看,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丈夫的影响仅体现在生活层面。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她们的丈夫在生产性的志向和行动方面的变化暂未获得现实验证。正如一位车间负责人所述:“如果在车间蹬车子,男员工也能拿到2500多元。但他们觉得男的蹬车子没面子,宁愿在家里玩也不来这儿干这个活。”(访谈编号:LB02)

(二) 原因分析

为何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其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在访谈中并未得到验证?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权力存在流动性,而且权力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表现为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寄寓于一系列事件之中,并在互动过程中得以形塑。在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制约下,农村妇女作为家庭主要照料者的角色要求并未随着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生产性劳动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妇女家庭权力的改善不足以撼动男性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传统家庭中固有的性别秩序并未被打破,男性在传统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使得他们安于现状。李小云等(2019)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山区开展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扶贫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妇女在经济发展和减贫中的积极作用并不必然会改善妇女福利,基于瞄准妇女的反贫困路径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外溢和性别福利异化显示了通过经济帮扶来实现性别平等路径的复杂性。

二是传统贫困文化容易使男性形成“自我设限”,这会扼杀他们的行动欲望和潜能。笔者通过实地观察以及查阅县志了解到,阜平县的贫困文化比较浓厚。阜平县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山林多、耕地少。长期以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区位的封闭导致与外界交流受限,容易滋生贫困文化。此外,由于阜平县作为革命老区、原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长期享受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照顾政策,获得的转移支付较多。政策优惠又可能强化地方的依赖性,导致当地滋生“等靠要”思想。对于当地一些男性,贫困文化就像玻璃罩一样“罩”在了他们的潜意识里。贫困文化的封闭性特征导致他们形成“自我设限”,缺乏强大的自我改善愿望,他们在内心深处默认了一个“心理高度”并常常暗示自己,使得他们不敢去挑战和超越自我,主动进取精神不足。

三是农村妇女本地就业的持续时间以及她们本地就业对丈夫内生发展动力影响的隐蔽性等因素，导致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前后其丈夫的变化难以显性化。现有理论和实践发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大的变化。课题组访谈的在帮扶车间就业的农村妇女的平均在岗时间为29个月，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丈夫在行为上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时滞性，需要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加以观察。此外，实地调研中对农村妇女丈夫的访谈样本偏少，导致对他们在生产性的志向和行动方面的信息获取不足，从而使得他们的变化不明显。

四是受新冠疫情和房地产行业低迷等外生冲击的影响，农村妇女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面临机会约束。课题组实地调研时正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相关行业就业困难。由于脱贫家庭的男性劳动力大部分的就业岗位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故而相关从业者大多在家待业。访谈中，一位车间负责人告诉笔者：“受疫情影响，现在村里男的大多闲着。你看我这儿现在十来个女员工，最起码有七八个女员工的丈夫都在家闲着。”（访谈编号：LB04）所以，新冠疫情影响和就业机会受限也是难以观测到她们的丈夫在生产性的志向和行动方面发生变化的原因。

Duflo（2012）就“妇女赋能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全面总结了各个国家的妇女赋能项目在缓解性别不平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强调了“赋能”对于妇女的发展与福祉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旨在为贫困妇女提供公平发展机会的扶贫项目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其效果是复杂的，而且这样的途径能否有效实现性别的实质性平等依然存在争议（李小云等，2019）。同样，本文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于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复杂性，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当地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讨和验证的问题。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基于心理资本理论和家庭发展理论，先从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并构建全文分析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阜平县农村妇女在帮扶车间就业的案例，深入分析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其个人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以及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带动过程及结果。本文研究发现：帮扶车间就业促进了农村妇女的市场劳动参与，明显提升了农村妇女个人发展信念和个人发展能力。同时，本地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增加重塑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以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家庭互动也随之改变，进而激发了家庭发展信念，改善了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了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丈夫的影响仅体现在生活层面，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暂未获得现实验证。这说明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在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复杂性，但不可否认，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的智慧 and 力量，以及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于家庭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为提升脱贫地区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一是帮扶车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就业帮扶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这种针对妇女的就业帮扶模式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的靶向性政策工具价值。无论是本地就业的农村妇女个人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还是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改善，都充分说明了基于社会性别瞄准的就业帮扶的有效性。所以，这一实践创新已远远超过“帮扶”本身

在个体层面的含义，产生了巨大的家庭正外部性。二是虽然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丈夫生产性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暂未获得现实验证，其中缘由比较复杂，存在各种制约因素，但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阻碍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外溢作用实现的因素，才更需要坚定向农村妇女赋能的正确认知，并将其作为长期坚持的施政方向。同时，要注意进一步引导拓展农村妇女的新角色、新技能、新技艺，以产生新的能量和新的创造力，更好地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应积极肯定帮扶车间在促进脱贫地区农户增收和防止返贫方面的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应通过财政补助、贴息贷款和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帮扶车间健康发展，真正让“小车间”托起“大民生”，成为脱贫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

虽然本文为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治理路径，但在研究层面还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一是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测度。虽然本文从家庭发展信念和家庭发展能力的维度进行了界定，但测量家庭发展信念需要借助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相关量表来实现，这也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二是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具有隐蔽性、深层次性、主观性等特点，导致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改善或提升的过程难以被全面捕捉，尤其是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丈夫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本文仅观察到生活层面的变化，生产性的志向和行为的变化有待进一步观察确认。三是本文肯定了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对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正向影响，但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只有在性别平等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相对收入变化导致的家庭时间分配才可能是理性的。因此，以女性为主体的在本地帮扶车间就业的这种就业形式可能造成农村妇女闲暇时间减少，自身福利受损，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

总之，促进农村妇女本地就业的帮扶效应并非仅限于增加收入，就业帮扶其实是推动农村妇女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与自我认知发生改变的抓手。通过就业帮扶，农村妇女的性别身份在工作、家庭与社会的平衡中得到重塑和凸显。笔者认为，农村妇女的命运有时候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她们缺乏觉醒的意识和打破僵局的能力，可一旦获得了“向上而行”的激励和帮扶，她们将迸发出改变自身、家庭和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女性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杜洁、宋健、何慧丽，2020：《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以山西 PH 与河南 HN 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 1 期，第 67-79 页。
- 2.杜鹏，2022：《农民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基于婆媳关系的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118-126 页。
- 3.傅安国、吴娜、黄希庭，2019a：《扶贫先扶志：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与质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 期，第 208-214 页。
- 4.傅安国、吴娜、黄希庭，2019b：《面向乡村振兴的心理精准扶贫：内生动力的视角》，《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 4 期，第 25-33 页。
- 5.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岳童、林肇宏、吴娜、黄希庭，2020：《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心理学报》第 1 期，第 66-81 页。

- 6.郝晶辉、王菲、黄佳琦, 2021: 《男性外出务工、女性赋权与家庭成员蛋白质摄入——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125-144页。
- 7.洪名勇、吴昭洋、龚丽娟, 2018: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第7期, 第101-114页。
- 8.胡军辉、叶尔肯拜·苏琴, 2016: 《经济社会发展与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 《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第23-35页。
- 9.黄薇、曹杨, 2022: 《常态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 反福利依赖的视角》, 《经济研究》第4期, 第172-190页。
- 10.郎亮明、张彤、陆迁, 2021: 《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 增收、扶智与扶志——基于陕西省821份农户调研数据》, 《农业技术经济》第9期, 第129-144页。
- 11.李胜旗、廖前豪, 2023: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第2期, 第20-44页。
- 12.李小云、陈邦炼、宋海燕、董强, 2019: 《“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第5-16页。
- 13.李小云、季岚岚, 2021: 《妇女的劳动脱贫——基于产业扶贫案例的性别敏感性分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期, 第5-10页。
- 14.梁辉、郑婷婷, 2019: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人口与社会》第1期, 第74-84页。
- 15.刘继文、良警宇, 2021: 《生活理性: 民族特色产业扶贫中农村妇女的行动逻辑——基于贵州省册亨县“锦绣计划”项目的经验考察》,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第15-27页。
- 16.刘靖, 2008: 《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 《经济研究》第9期, 第136-149页。
- 17.陆继霞、吴丽娟、李小云, 2020: 《扶贫车间对农村妇女空间的再造——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 《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第36-46页。
- 18.莫光辉、张菁, 2018: 《基于“人本主义”视角的贫困人口扶志扶智路径创新》,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3期, 第102-110页。
- 19.苏海, 2021: 《制度嵌入生活: 农村贫困女性减贫的本土实践及反思——源于“扶贫车间”的案例考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73-80页。
- 20.苏毅清、邱亚彪、方平, 2023: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 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机制解释》,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第72-89页。
- 21.陶涛、刘雯莉、李婷, 2021: 《长幼有序, 男女有别——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养老支持分工》, 《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第25-46页。
- 22.汪三贵、胡骏、徐伍达, 2019: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志智双扶”问题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5-11页。
- 23.汪三贵、黄奕杰、马兰, 2022: 《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特征变化、治理实践与巩固拓展路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5-15页。
- 24.王磊, 2023: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经济纵横》第7期, 第111-118页。

25. 吴帆、李建民, 2012: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人口研究》第4期, 第37-44页。
26. 吴贾、陈丽萍、范承泽, 2022: 《母亲收入、家庭氛围和子女人力资本发展》, 《经济学(季刊)》第4期, 第1169-1192页。
27. 吴娜、傅安国、黄希庭, 2021: 《贫困家庭心理资源对子女脱贫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221-228页。
28. 邢成举, 2020: 《村镇工厂与农村女性反贫困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第47-55页。
29. 熊猛、叶一舵, 2014: 《心理资本: 理论、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 第84-92页。
30. 杨永伟、陆汉文, 2019: 《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缺乏的类型学考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128-136页。
31. 殷浩栋、毋亚男、汪三贵、王瑜、王姮, 2018: 《“母凭子贵”: 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108-123页。
32. 尹志超、张诚, 2019: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4期, 第165-181页。
33. 郑筱婷、李美棠, 2018: 《女性就业与收入对其配偶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第130-147页。
34. 左停、田甜, 2019: 《脱贫动力与发展空间: 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研究——以中国西南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例》, 《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 第140-148页。
35. Dalton, P., S. Ghosal, and A. Mani, 2016, “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126(590): 165-188.
36. Duflo, E., 2012,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4): 1051-1079.
37. Haushofer, J., and E. Fehr, 2014,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344(6186): 862-867.
38. Haushofer, J., and D. Salicath, 2023,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Where Do We Stand?”, NBER Working Paper 31977, <http://www.nber.org/papers/w31977>.
39. Kremer, M., G. Rao, and F. Schilbach, 2019,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B. Bernheim, S. Vigna, and D. Laibson (eds.)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345-458.
40. Luthans, F., B. Avolio, J. Avey, and S. Norman, 2007,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0(3): 541-572.
41. Luthans, F., and C. Youssef, 2004, “Human, Social, and Now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anagement: Investing in Peopl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33(2): 143-160.
42. Mani, A., S. Mullainathan, E. Shafrir, and J. Zhao, 2013,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341(6149): 976-980.
43. Phipps, S., and P. Burton, 1998,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Influence of Male and Female Incomes on Patterns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Economica*, 65(260): 599-613.
44. Semeels, P., and S. Dercon, 2021, “Aspirations, Poverty, and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7(1): 163-183.

45.Thomas, D.,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4): 635-664.

(作者单位: ¹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²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How does Rural Women's Local Employment Enhance the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Their Families? A Case Stud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

LI Fei LI Xinyue XIAO Zhifang YANG Wenyuan

Abstract: Enhancing the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family's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from two dimensions, which are families' development beliefs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ntire study. Taking rural women work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s in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women on their personal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e driving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their families. We find that, first, employment in the workshops has promoted rural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beliefs and abilities. Second, increased income from local employment has reshaped the family status of rural women, and the family interaction linked by economic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s has also changed, which further stimulates family development beliefs, improves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ies, and enhances the overall intrinsic development motivation within the famil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impact of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women on their husbands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lif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usbands' productive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has not yet been verified in realit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mployment and family development is complex in real-life situations. Nevertheless, we cannot deny the wisdom and power embedded in rural wome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women in family development. Therefore, our paper suggests that gender-targeted aid program should be a public policy tool to enhance the self-drive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within families and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refinement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and modernization of pover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Keywords: Rural Women; Local Employment; Self-driven Motivation of Familie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hop; Psychological Capital;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